

# “三农”金融缺口约 3.05 万亿

## 涉农互金平台仅十几家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中国‘三农’金融缺口约 3.05 万亿,涉及‘三农’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仅十几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三农”互联网金融《蓝皮书》主编李勇坚站在台上难掩表述时的尴尬。

2016 年 8 月 18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三农”互联网金融蓝皮书:中国“三农”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2016)》在北京举行发布会,首次对互联网金融(简称“互金”)切入“三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分析。

### 涉农平台仅十几家

199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小额信贷之父杜晓山,主导中国社科院课题组通过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领导协调,在易县进行农村“小额信贷”试验。当时的易县是离北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课题组通过与易县政府协商项目具体事宜,成立了“扶贫社”,并确立了具体章程,规定资金使用程序,将小额贷款利率定为 8%。接着,“扶贫社”以社团组织完成了注册,并在易县西北部的西陵镇五道河村成立了第一个中心。

随后,农村小额信贷逐渐开始发展。互联网金融兴起以后,也开始在农村发力。然而其发展并不顺畅。

《蓝皮书》指出,当前,“三农”互联网金融的规模与体量都非常小。以 P2P 为例,在全国 2000 家正在运营的 P2P 网贷平台中,专注于“三农”互联网金融的平台不到 20 家,而且这几家平台大部分都是 2015 年新上线的,主要一

些做众筹的平台,包括淘宝众筹以及其他一些公益性平台,如宜信开发的“宜农贷”等。

经过对于“三农”互联网金融相关的各个平台 2015 年发展情况进行整理,《蓝皮书》发现,2015 年,全国“三农”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总体业务规模为 120 亿元~130 亿元,中位数为 125 亿元,其中包括 P2P 网络借贷 124 亿元,众筹 1 亿元。

### 大多靠补贴推动

2009 年,宜信集团推出互联网金融平台“宜农贷”,有爱心的出借人可以直接一对一地将富余资金出借给那些远在贫困地区需要贷款资金支持的农村借款人。

根据“宜农贷”产品的表述,贷款利率为 2%,即贷款人贷款 100 元,年终还款为 102 元,利息仅为 2 元,除去“宜农贷”平台管理、维护费用等,基本没有盈利空间。因此,“宜农贷”产品被业内认为公益性产品。

而由于公益模式在中国的推广难度,宜信“宜农贷”这种公益扶贫小额信贷模式并没有取得太大效果,主要表现在自我造血相对不足。

《公益时报》记者在查阅宜信 2013 年报显示,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宜农贷”累计资助农户 9708 户,累计出借 5800 万元以帮助农户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经统计,其中 27%用于种植,32%用于养殖,38%进行商业经营,3%用于其他生产模式。

2014 年至 2015 年,宜农贷发展速度才有所加快,到 2015 年底,宜农贷出借金额超过 1.35 亿元,帮助 23 个贫困地区的

1500 余户贫困家庭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又有 14 万多名爱心出借人加入宜农贷公益助农队伍。

但宜信“宜农贷”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宜农贷”定位为公益属性,平台运营和人工成本均靠宜信其他项目补贴。

李勇坚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时表示:“涉及‘三农’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自我造血非常重要。按照‘宜农贷’目前贷款利率 2%来计算,确实不盈利,这凸显公益性,但平台如果没有外部资源投入,可持续性发展将成问题。”

“如果将贷款利率适当提升 1%~2%,达到年率 3%~4%,这将能够有效解决机构可持续性问题的,参照此,其他想要参与运营平台的积极性也能够提升。”李勇坚补充道。

### 有待大数据支撑

成立于 2007 年的联想控股成员企业翼龙贷是一家专注于为广大三农、小微企业提供 P2P 借贷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在全国一百多个地级市设立运营中心,覆盖上千个区、县及近万个乡镇,而即便是这样一家快速扩展的企业,对于潜在客户的寻找方式也只能通过人际传播和散播广告。

翼龙贷创始人、董事长王思聪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扶贫客户市场开发对于企业来说确实是一个问题,通过人际传播开发客户,这意味着成本就会增加,现在国家和相关机构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客户发展数据库,表明哪些是有发展意愿和能力的,暂时只能通过企业自身员工进



发布会现场

行寻找开拓,能利用的现成数据并不多。”

李勇坚表示:“互联网金融时代要想使得助农得到真正实惠,首先应该做到两个识别。其一,公益领域需要的弱势群体识别,这要借助于大数据,并不是一、两家组织就能做好,这需要政府部门,以往电商平台,将涉农数据贡献出来。其二,应该建立信用识别体系。有还款意愿和能力的借款户通过大数据表现出来。只有两者结合才能使得‘三农’互联网金融市场越做越大。”

而目前,为了解决公益模式中客户数据信息不对称问题,宜信“宜农贷”项目的运营模式是宜农贷平台与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对接,目前已有 14 家优秀的农村小额信贷机构成为平台合作机构。机构向宜农贷平台提供农户信息,宜农贷平台通过机构向农户提供爱心款。通过双方合作,实现风险最低化和资金利用率最大化。同时,宜农贷坚持对合作小额信贷机构进行严格考察,并采用国际通行的“五户联保”风险防范机制。

### 金融缺口约 3.05 万亿

《蓝皮书》指出,2014 年,我国农业增加值为 53882 亿元。全国农户贷款余额(是指“某一节点日期为止,借款人尚未归还放款人的贷款总额”)为 5.4 万亿元,“三农”的总体资金投入为 13 万亿至 14 万亿元。

近几年,我国农村金融支持力度在下降。

根据《蓝皮书》测算,我国农业贷款余额与农业增加值的比例,在 2004 年为 1.08:1,而到 2014 年,反而下降到 1:1。数据表明,农业贷款余额的力度在下降,而 2004 年,“三农”金融的缺口不低于 4000 亿元。

具体测算其他行业的资金投入构成可知,在工业或服务领域,信用贷款资金占全部资金投入的比重大约为 70%,而在“三农”领域资金投入却没有达到这个数额。如果信用贷款在“三农”资金投入能够达到 65%,则 2014 年的贷款投入需求大约为 8.45 万亿元。而实际农户贷款余额约为 5.4 万亿元。因此,我国“三农”金融的缺口约为 3.05 万亿元。

# 不到 80 家社会组织参与流动儿童教育服务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近日,新公民计划研究部发布第一期《流动儿童教育研究简报》,重新梳理并更新了流动儿童数据、2016 非京籍儿童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流动儿童公益组织图谱等内容。勾勒出我国流动儿童工作的基本现状。

中国有 1 亿儿童受父母迁徙影响,成为留守或流动儿童,这类群体的受教育情况常常被问题化,而公众对其认知模糊,随之而来的是参与度较低。

根据新公民计划 2015 年搜集到的信息,目前全国有不到 80 家社会组织参与到具体的流动儿童教育服务中,由于各个组织地域性和服务内容的差异,他们对彼此之间项目开展情况等了解甚少,无法借鉴和交流经验。

### 3581 万流动儿童

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十大

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广州、苏州、重庆、成都、温州、佛山,其中排名第一的上海流动人口数达到 961 万人。其中的流动儿童(0~17 周岁)数量,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翻倍增长,2000 年是 1982 万人,2010 年达到 3581 万人。以上数据来自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儿童发展指标图集》。从 2010 年到现在,我们相信数字已不止如此。

流动儿童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起来,城市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了他们的观念、气质和认同,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已经随父母在城市定居,在事实上构成了城市的第二代移民,但因为政策界定,仍被官方定义为“流动人口”。新公民计划曾联合 8 个城市的 10 家从事社区教育工作的

公益机构撰写的《流动儿童社区教育需求调查》显示:包括出生在城市的儿童,总计有超过 70% 的打工子女在学龄前来到城市;有超过 50% 的孩子明确表示喜欢在城市生活。

“流动人口”背后,是无法正常获得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尴尬现实,而对于其中的流动儿童和家长来说,更麻烦的是无法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

### 地方政策可能赶不上变化

2012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2016 年,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亦多次表示:“要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切实简化、优化随迁子女入学的流

程、证明的要求。”但在各地制定具体政策时,仍面临着许多非常具体的问题。

以北京和广州为例。4 月 15 日,北京市公布了 2016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相关政策,各区县也陆续公布了相关政策及“非本地户籍适龄儿童的五证审核细则”。五证的要求延续了过去两年的审核标准,整体难度与 2015 年相当,但其中 7 个区县要求提前在网上提交五证审核资料(错过日期将无法在街道办事处)。

广州于 2014 年制订的异地中考政策有 3 年过渡期,2017 年将全面实施。这一政策取消了以往非户籍生入读公办高中需要缴纳的几万元择校费,另一方面则新设置了针对非户籍升公办高中的门槛及招生限额,“公办普通高中招收非政策性照顾借读生不超过学校所在批次招生

计划的 8%”,将一部分非户籍考生拒之门外。研究显示,2012~2015 年,成绩排名前 10%~25% 的考生读公办高中的空间均有不同程度压缩,排名 25% 以外的依然不能被录取。在非户籍考生人数持续增加、本地户籍考生逐年减少的趋势下,2017 年异地中考政策全面实施,将很可能在中高分段的非户籍考生中带来更激烈的竞争。

4 年前,报名参加广州市中考的非广州户籍考生约占总数的 20%,4 年后这个比例超过了 32%。作为重要的人口流入城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及升学出路已经不是影响“少数”孩子和家庭的公共议题。如何在“同一蓝天下”更充分利用以及更公平分配公共资源,仍然是流动人口集中流入城市所要面临的政策挑战和关乎民生的重要选择。